

“文史合一”:历史言说的传统维度及其误区

——以易中天的《品三国》为例

葛红兵, 徐渭

(上海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44)

摘要: “文史合一”的学术传统使得中国史学在古代有庙堂、文人、民间三种价值取向, 演变至今则蜕变为代表“民间”的戏说、娱乐之风畸形发展。易中天《品三国》打着精英文化的旗号, 实际上是“文史”不分的媚俗之说。中国的历史言说应该具有超越性的视角, 上升到对历史精神的形而上思考。

关键词: 文史合一; 易中天; 《品三国》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历史阐释, 绕不开“文史合一”这一传统。中国是世界上史学最早熟、发展最完备的国家之一, 然而吊诡的是, 中国史学的繁盛不仅没能使前朝往事清清楚楚、大白于天下, 反倒形成重重烟雾, 使历史真相幽暗难辨。文学重虚构、重修饰, 强调主观情感与理念的表达; 史学的本分则是秉笔直书, 忠于事实本身。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叙事文体纠缠不清的直接后果是: 最需要自由挥洒想象力的小说往往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得活像人物传记; 最讲究真实可靠、叙述严谨周详的史书每每写成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这种现象何以在中国成了源远流长、垂范至今的学术传统?

“历史”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特殊地位。中国传统史书根据价值取向大致分“庙堂史”、“文人史”和“民间史”三类。“庙堂史”乃是代表官方意志、供于庙堂之上的“公器”, 在数千年来中央集权制度一以贯之的中国, 自然地位最高、影响最大。中国古代战乱频仍、朝代更替频

繁, 几乎每个朝代建立伊始都要组织人力, 为前朝修史, 名义上冠冕堂皇, 说是总结前朝施政得失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鉴, 其实更重要的政治意图是一方面丑化前朝, 肃清前朝的“思想遗毒”, 以绝天下人怀旧恋故之念; 一方面强调“我朝”英明神武、奉天承运、合理合法, 并且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它们是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工程中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政治任务如此, “庙堂史”无法秉笔直书, 所以只好借用“文”气十足、“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始作俑者应该是当年整理《春秋》的孔子。“文”者, “纹”也, 在古代是“修饰、美化”之意。据说《春秋》是直笔写就而且书成之后“乱臣贼子惧”。事实却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 并没有真正实话实说。孔子事后感慨道: “知我者, 其《春秋》软; 罪我者, 其《春秋》软”, 其实就是间接承认自己因为捍卫政治信仰而不惜曲笔写史, 甘愿背后世骂名而不悔的表白之辞。一套“二十四史”, 摆出来洋洋大观, 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如此“国家本位”的“庙堂

收稿日期: 2006-08-10

作者简介: 葛红兵(1968-), 男, 江苏南通人,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研究。

徐渭(1977-), 男, 原名徐秀明, 山东济宁人, 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研究。

史”。梁启超批判中国历史为“帝王家谱”，可谓入骨三分、一语中的。

政治高压所限，“庙堂史”即便材料再翔实、体例再完善，也必然言语乏味、吞吞吐吐。真正史识过人、文采斐然的，还是出自胸有丘壑而且博闻强记的学者之手的“文人史”。“文人史”的杰出代表《史记》，同时也是“文史合一”的学术传统下史学著作的代表之作。司马迁发愤著书，一腔热血、满腹悲愤，将自己前半生的游历学识、生命体验融为一炉。《史记》既有“庙堂史”的严谨周至，又有饱满鲜明的个人性情和对人生、世界深邃的洞察和形上思考，不仅成为“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史学名著，而且成为后世文学家竞相学习的典范。文人修史既属个人行为，自然政治色彩较少，见解每每独到，言辞相对大胆，但也往往因此遭嫉，甚至酿成大祸，如“明史”一案，因此数量有限。坊间流传最多，对百姓影响也最大的，其实是较为通俗甚至流俗的“民间史”。“历史”也并非全是庄重严肃的内容，高雅脱俗、忧国忧民在日常生活中到底能占多大比例？野史稗史也好，秘史艳史也罢，同样是生活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机缘巧合的话同样可能左右历史流向。街谈巷议、民歌谣传，甚至宫闱秘闻、勾栏艳话……“民间史”无不兴致勃勃、照单全收。这些为“庙堂史”、“文人史”顾忌重重或不屑一顾而大量丢弃的材料中，其实蕴涵着许多可以洞见人性真实与历史真相的历史边角料，只是阅读时需要有一双披沙沥金的慧眼罢了。鲁迅等学者极力主张多读野史，原因大抵在此。几千年的中国史就这样在“庙堂史”、“文人史”、“民间史”的重重叠叠与众声喧哗中流传至今，依然影影绰绰、真伪难辨。几千年来汗牛充栋的这许多史料，却始终缺乏形而上的理性思辨，始终没能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哲学。

时至今日，“庙堂”土崩瓦解，多少承“民间”精神余绪的种种“戏说”大行其道。当然，这种“历史娱乐化”也没什么不可以，大量的戏说历史剧、古装肥皂剧把以往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塑造为有血有肉甚至傻傻笨笨的喜剧形象，对肃清国人的封建奴性意识多少有些好处。然而，此种“民间”变体毕竟相对低俗粗鄙、难堪重任。如果中国文史合一的历史阐释传统，其现代转变，仅仅是由原本层次分明、相辅相成的“三位一体”演变

为“民间”的畸形膨胀，那么中国文化中的精致高雅将要寄身何处呢？当下炙手可热的易中天和他的《品三国》就是最好的例子。

平心而论，易中天解“三国”，还是很有时代特色的，比如他用的心理分析的方法，生动活泼的讲述方式，很多有时代特色的词汇，他甚至可能是“三国”接受史上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解读者和传播者。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认为史学家应该用具有时代精神的思维去理解和把握过去的文献。易中天未必有如此明确的史学意识，但他成功的最大原因的确是史学思维的“现代化”——按需生产的准确史学市场定位——而不是什么“现代视角”。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极端功利的时代，一部分人想看尔虞我诈、操弄权术的故事，想听别人对此的分析和指教，易中天就很好地满足了他们。《品三国》满篇权术、地位之争和功利计算是他的分析目标：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君臣之间的背叛，兄弟之间的杀戮，国与国之间的血腥争夺……表面上自称“平民立场，现代视角”，骨子里是“帝王立场，小人视角”。

真正的“平民立场”应该是替百姓着想、为百姓说话，可易中天虽屡出惊人之语，却并无一处谈及百姓苦难，反倒特别喜欢给曹操、严嵩、秦桧等大奸大恶、祸国殃民之辈平反，而且理由似是而非，无法令人信服。曹操的行事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他虽然杀戮过重，但慷慨豁达确有英雄气象。但易中天以陈宫反曹被擒而受优待为例来证明他的宽宏大量，“甚至对于背叛了自己的朋友，曹操也很看重当年的情谊”^{[1](P19)}云云，就是明显的春秋笔法、皮里阳秋了。陈宫何人？“捉放曹”的主角。当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逃出洛阳、亡命天涯；陈宫时任县令，手下衙役已经捉住曹操，明明可以押送京城请功受赏，但他觉得曹操是位志向远大的义士，于是弃官追随曹操一同出逃。但曹操先是疑心过重误杀吕伯奢的家人，后来明知犯错仍然杀死吕伯奢以斩草除根。陈宫为之心寒，觉得放而又杀固然不妥，继续追随则是为虎作伥，才弃曹操而去。这种正义之举也算“背叛”？易中天大概也觉说不过去，所以只谈曹操抓住陈宫之后如何不愿加害，陈宫不屑一顾、毅然赴死之后如何替他赡养老母、照顾家小。其实陈宫对曹操有活命之恩，曹操杀之有愧。他贵为丞相权倾朝

野、富有四海,照顾几个没有任何后患的老弱,既能摆脱忘恩负义的骂名,又可收买人心,何乐而不为?这与宽宏大量何干?

还有严嵩、秦桧。易中天觉得“仅凭此案(指吕伯奢一门血案)就说曹操奸险歹毒,是有疑问的”^{[1](P15)},可见慎重;却单凭严嵩“一个七八十的老人,心甘情愿地充当皇帝实验室的小白鼠”一事,就可以发出“你还说他是奸臣”的质问,甚至说他是“大大的忠臣”,就让人不太明白了。^{[1](P242)}幸好上文有“就连说严嵩父子是‘奸党’,也是冤枉的。他们两个恶贯满盈不假,对皇帝却是忠心耿耿……”之语——^{[1](P242)}原来易中天所谓的“忠臣”,就是忠于皇帝的意思;百姓死活,与“忠臣”何干?(这不是“帝王立场”是什么?)严嵩不仅不是“奸臣”,而且十分委屈,因为他“原本也是‘正人君子’……自从嘉靖皇帝发过一次‘雷霆之怒’后……踏上了媚上、邀宠、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1](P242)}易中天认为:严嵩这个“奸臣”,其实是嘉靖“培养”出来的,而嘉靖这个混账皇帝,又是帝国制度培养出来的。因此以“莫须有”之名冤杀岳飞的秦桧和赵构也不坏——“混账和丑恶的就不是嘉靖和赵构,而是皇帝制度。”^{[1](P243)}这个意思史学家们早就说过无数遍了,自然极有道理。但易中天的讲法与众不同,他对历史罪人们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之同情”:把奸臣之罪推给皇帝,皇帝之罪推给抽象的制度,好像只有“万恶的皇权制度”应该对历史负责。于是人人清白,乾坤晴朗了。其实罪就是罪,无论理由千条万条,犯罪就要承担责任接受惩罚。奸臣们生前荣耀无比,死后才被万人唾骂,这已经是最轻的惩罚、迟到的正义了。如果连百姓这点可怜的舆论监督权的合理性都要被嘲弄取消,“百姓立场”何在?再者,谁说趋炎附势、为虎作伥就不混账丑恶?严嵩对嘉靖如此“无微不至”,为的还不是换取皇帝的偏袒纵容?严嵩的“实验报告”不过是邀功请赏的奏章,嘉靖自然也心知肚明,否则为什么偏偏让如此“忠臣”充当“小白鼠”呢?这哪是什么“忠心”?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过一场丑恶的交易罢了。毫无人格操守、道德底线,皇帝雷霆一发,“正义感”就荡然无存,这种“正人君子”有何价值可言?“制度才是问题所在,皇权才是万恶之首。”^{[1](P243)}这话当然不无道理,可如果把它绝对化,把一切奸恶都说成是“人

在江湖(庙堂),身不由己”,把个人视为等级制度下任上司摆布的提线玩偶,完全抹煞个人坚守的有效性和可能性,那就大错特错了。面对非人的奴役制度,是严嵩这般奴颜卑膝换峨冠博带、贾诩那样危言危行而明哲保身,还是祢衡一般耿介刚直、成玉石之慨、曹操一样揭竿而起以取而代之?如果易中天从自己的情感倾向中跳出来,以曹操等人为例讲中国古代士人普遍面临的人生困境,即便对当今社会也是极有意义的。遗憾的是他的情感立场完全在“帝王将相”那边,只看到他们在玉带蟒袍中被权力扭曲的无奈,无法体会到集权制度下黎民百姓食不果腹、生如草芥的痛苦。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他的“小人视角”——就是易中天自己都有所察觉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1](P155)}。具体表现是:他几乎把“三国”英杰们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或心理动机都归结为对权力、欲望和利益的无餍追求。

1.“权力”。诸葛亮隐居时淡泊名利、清静自守,出山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乃是令人敬仰的一代名相。在易中天眼里,他却不过是个精于算计、故作姿态的高级白领,待价而沽、一心大权独揽的政治CEO;义娶丑妻,是为了获得岳父家的政治资源,与大军阀刘表攀亲——即便从未到刘表那里当官也摆脱不了这种嫌疑;辅佐刘备,是因为在那边可以专权,而且“在大家都以为刘备是垃圾股时,诸葛亮却把他看作绩优股”^{[1](P142)},可以傍政治大款,捞政治资本;鞠躬尽瘁,是因为“刘备是诸葛亮再三考虑精心挑选的老板。既然如此,他就决不会轻易跳槽。”^{[1](P143)}一个学者如果只是这样讲“三国”,那就真的把“三国”讲得“下”了。说穿了,“三国”中的人物,如果只这样讲,就是没有政治信念,没有道德底线,没有人格操守,没有超越性信仰的粪土之徒。这样讲,就把“三国”讲庸俗了。讲“三国”,要讲人的事儿,也要讲天、地、神的事儿。真正重要的,其实品“三国”,应该是品一点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中国人的忠义观念,应该品出一点天、地、人、神的大义来,应该有反思,有批判,有褒扬。否则品的只不过是那个勾心斗角的智慧,那个对人的角力的崇拜……这样的“三国”,能给读者什么呢?只能是把中国人庸俗化,把政治庸俗化,把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庸俗化。

2.“欲望”。讲课并非不可调侃,但在文化栏目中屡屡拿男女之事开涮总是不妥。“曹操虽然抢走了关羽的老婆,却也被别人抢走了‘空城计’

的发明权”^{[1](P222)}、“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刘备和关羽、张飞,是‘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三个人‘寝则同床’时,他们的太太在哪里?”^{[1](P128)}老婆丑点对诸葛亮来说算不了什么,“娶妻娶德,纳妾纳色,是当时的常规观念”^{[1](P141)}。这些说法实际上暗含的意味和趣向不言而喻。对“床”这个字的爱好,对“寝”这个字的人迷,也许无可厚非,知识分子也可以有,如果拿到学术殿堂讲“房内考”什么的,还可以显示知识和文化,但是,讲“三国”用这些,就只能暴露自己的趣味和态度了。

3. “利益”。张口闭口职场术语:诸葛亮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像郭嘉说的那样,为自己选一个好老板……”^{[1](P142)}、“刘备集团好比一家很有前途的民营企业……诸葛亮则好比一位超一流的职业经理人……”^{[1](P146)}。“三顾茅庐”无非是诸葛亮自高身份的炒作手段,“什么会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满腹经纶的朋友,道貌岸然的文人,都是诸葛亮的‘托儿’。其目的,都是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1](P155)}这样的说法在易中天的书中比比皆是,很容易误导读者,把庸俗当有趣,把俗解当真知。刘备之于诸葛亮,不是老板和雇工的关系,把他们等同于当今的老板和雇工关系,是对政治的庸俗化理解。本来,学术的东西、思想的东西,语言活泼一点没什么,但是,要贴切,易中天的这种说辞,不仅不贴切,还把历史庸俗化了。职场竞争崇尚利益至上不计其余,而《三国演义》是一本政治信仰、道德信念极强的理想之书,两者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易中天反反复复把它们混为一谈,到底只是讲课的一种方式,还是根本就不理解“三国”人物所代表的人文价值观?诸葛亮高风亮节、从容进退,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取向与最高境界;关羽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是广大民众心目中忠义两全、尊之为神的人格典范。他们早就不再是小说人物、历史人物,而是已经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中华文化的文化象征和人格符号了。

这当然不是说“偶像不准破坏”,问题是文化遗产和真正的古董文物一样难成易毁,对待它们一定要慎之又慎,不可轻言废弃。破坏之前就要考虑清楚要拿什么来填补它们的空白。否则像易中天这

样,为讲课通俗而不惜粗俗、低俗以媚俗;为语出惊人而随便翻案,替曹操、严嵩平反,拉诸葛亮、关羽下水,大家全不是东西,永恒轮回的只有权力、欲望和利益,让人觉得那些世代传颂的“三国英杰”虽然看上去道貌岸然、自命清高,骨子里其实更加龌龊贪婪,为自身权力、地位和利益而蝇营狗苟、斤斤计较,反不如曹操那样胆大直言的“真小人”来得爽快……这究竟是“品”还是“毁”?“品”的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中国历来文史不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区别对普通读者而言意义不大。但是易中天的解读,恰恰是在这个上面做足了文章。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坚持“微言”和“大义”的统一,如果把历史都说成了胜者王侯败者贼,而胜败又都解释成是权术使然,人的智慧(甚至个别人的智慧)使然,那就会让读者以为权术是胜败的关键,只要玩转权术就可以战胜历史,把人的智慧看得比天、地的常数更重要,没有对大历史规则的敬畏,没有对大信仰大品格的敬畏,那读“三国”就会走向反面,以历史的名义反历史。说白了,没有历史观的历史、没有人文理想的历史、没有大敬畏的历史,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事件,一堆由个人智慧决定的偶然性。

易中天打着“精英文化(文人史)”的旗号,骨子里贩卖的是“大众文化(民间史)”中最恶俗、最粗鄙的私货;名义上是正说历史、正本清源,传播知识和真理,实际上没有任何针对知识的科学态度、针对历史的观念信仰;不是教育大众,而是娱乐大众。他自称讲述历史真相,其实不过是历史的一种可能性,而且是最没有文化含量的一种可能性。因为他自己也承认,即便是他用来批评《三国演义》的正史,也有靠不住的地方、靠不住的时候——“《三国志》、《后汉书》等等记载未必可靠”^{[1](P5)},那么在诸多可能性中,他判断真伪的标准是什么呢?从《品三国》书后的“附录二:我的历史观”一文可见端倪:文章开头虽然说“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是没有答案的”,但后面紧接着就说“善,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但我们不要忘记,恶可能也是一种本性,一种真实的存在。其实‘追求’二字,本身就意味着‘善’这个东西,或者本来没有,或者容易丧失……”^{[1](P231)}很明显,文章强调的实际上是人性恶的部分,这其实就是作者贯穿全书,用以明辨历史的“历史观”,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用最普遍的恶意揣度“三国”人物,待奸贼如此之厚、待贤士如

此之薄的根本原因。这自然也是一家之言,易中天有个人的学术自由,他人无权干涉。奇怪的是易中天偏偏要去干涉罗贯中的创作自由,频频指责《三国演义》不够真实。

明明是文学教授,却“崇史抑文”如此,在“文史合一”的圈子里团团打转(用文学的标准来要求历史——他的《品三国》充满了文学性讲述;用历史的标准来要求文学——用三国史的真实标准来衡量《三国演义》这部文学作品),根本体会不到《三国演义》这部伟大小说的真正意义与价值:三国时期是一个豪杰并起、个性张扬的英雄时代,《三国演义》讲的是一个杀戮遍地的乱世故事,却让人觉得穷兵黩武可鄙、杀戮叛逆可耻,可谓自有高格。小说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英雄俊杰:诸侯武将英武骁勇、纵横决荡,文人雅士羽扇纶巾、挥斥方遒,可谓各擅胜场。大小诸侯对身边的文人谋士口口声声以“先生”相称、恭恭敬敬以平等之礼相待,丝毫没有强权在手、盛气凌人之态,可谓志趣高远。而易中天的典型评述往往是:

“道就是人性,就是人心。曹操用人之道的核心,就是八个字——洞察人性,洞悉人心。”^{[1](P115)}

“我们已经不难看出郭嘉为什么能料事如神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把人琢磨透了……其实时事也好,兵事也好,说穿了都是人事。只有精于人事,才能明于时事和兵事啊!”^{[1](P137)}

“鲁肃这样说,是因为他看透了孙权的心思;而他能够看穿孙权,又因为他和孙权有同样的想法。”^{[1](P137)}

诸葛亮与刘备、郭嘉之于曹操,都可谓志同道合、亦师亦友,绝不像易中天说得那样,是简单的雇佣或者主仆关系。《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曹操等英雄智士之所以鹤立鸡群、笑到最后,绝对不是因为浅薄的武力最强或者鄙俗的“精于人事”,而是因为他们志趣高远,首先关注的是天下大势与历史未来,而不是什么权力地位、欲望利益,正如易中天偶然福至心田、灵光一现时说的那样,诸葛亮的“抱膝长啸”和“好为《梁父吟》”“寄托了他对世事人生的深度关切和悲悯情怀”,^{[1](P140)}而曹操的《观沧海》、《蒿里行》则蕴含着曹操对宇宙运行的体悟、对天下苍生苦难的深切同情。他们的精神境界远在同时代人之上,从这个高度俯瞰世

事纷争,所以从容应对、罕有敌手,这才是《三国演义》中大智慧的真义。

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到淫,革命家看到排满。学术研究不必定于一尊,易中天当然可以对《三国演义》保留自己的观点,在这样功利实际的民情,在当今如此喧嚣无序的时代,这也确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最为真实的思想境界与价值取向。作为普通人这无可厚非,然而“易中天品三国”一旦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化现象,并且出现大量对不同意见破口大骂的“乙醚”,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国古代士人梦寐以求的荣誉,是“帝王师”,几乎与“学问人品天下第一”同义,职责当然是造就一代明君,以造福百姓、免得国家遭难、社稷蒙羞。中国虽然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实际上千百年来一直盛行“愚民政策”,民众文化知识水平普遍不高,而且多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中得来。如今是影视、媒体唱主角的时代,由国家电视台强档“百家讲坛”播出,以易中天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开讲,据说他还是人气最高的讲述者之一,无形中成了“百姓师”,这个影响还了得?不客气地说,到底要把广大观众、读者引向何方呢?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三国演义》的价值远远高于《三国志》等史书,因为前者包含了比“历史真实”更高的“审美理想”,事关民族信仰、民族性格、民族精神。而易中天恰恰是解构了这个理想。实际上评书《三国》是很好的资源,单田芳、袁阔成等传统评书大师,几乎也是深谙传统精髓的文化大师,他们在说书的时候,对人物、事件也会不断地加进去自己的见解,他们的那个方法可以借鉴、学习。大众化不等于娱乐化,把历史、文化娱乐化不是普及文化的好思路。

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

1. 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简单地说,就是需要一个真正高屋建瓴、具有超越性视角的历史观——一种历史哲学。

中国史学始终发展缓慢,无法走出传统史学的考据套路,这就是历史理论欠缺,没有形成真正的历史哲学的缘故。这一点应该向西方现代史学思想取经。

科林伍德认为,“历史的本质不在于构成它的个别事实,不论这事实有多大的价值,而在于它是一个过程,一种由此及彼的发展。”历史事件是人类过去思想所表现的行动,只有了解了事件后

的思想,才算真正了解了历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科林伍德语),“对史学来说,所要发现的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其中所要表现的思想……。”^{[2](P242)}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味苦苦纠缠于某个史实的真伪其实意义不大;要紧的是建立真正的大历史观,应该意识到历史不仅仅是简单的民族史、国别史,在更大的范围内属于人类史和世界史的一部分;认识到在漫长而宏大的历史长河里,整个人类史都不过是短短一瞬,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更如微风过耳,斤斤计较于个人、民族甚至国家的得失荣辱未免可笑,才会建立人类总体史视角的历史观,习惯于在人类史大视野中考察历史细节。如此一来,简单的历史关怀方可转化成彼岸意识、超越情怀,而不是像易中天那样仅仅解释成是人的权术斗争史和国族兴衰史。

2. 如何超越“文史合一”的中国学术传统?“文史合一”传统自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也造成了中国文化中的许多难以解决的疑案和混乱,比如中国历史的真正起点、三皇五帝存在的真实性等等。对文学的伤害则是使得中国叙事文学“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萌芽虽早,却在千百年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难以获得独立的地位与成熟的可能。易中天还是在这个传统内,所以名为“品三国”,实际不是

品,是嚼,而且是混嚼。把《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混起来,正着混、反着混,混成一锅糨糊,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自己到底“品”的是小说还是历史,所以书名也只能含糊糊糊了。

其实,在“文史合一”的大背景下,《三国志》和《三国演义》都是叙述态的“作品”,都不是原生态历史,不过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罢了。

现在是要严格区分,不能用文学的要求要求历史,也不能用历史的要求要求文学。具体做法是两个面向:往者不可谏,已有的中国史研究要谨慎,史学家们应该设身处地去重新思想古人的思想,“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思想它们”^{[2](P281)},要形成自己的史学价值判断,不仅仅是了解过去事件前后相继的过程,而是渗入自己的价值观念并做出前人对与不对的判断;来者犹可追,日后的历史撰写者要有所担当,忠于职责。否则未来的中国历史也只能周而复始,在事实与神话之间摇曳不定了。

参考文献:

- [1] 易中天. 品三国(上)[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2] 科林伍德. 历史的观念[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Synthesi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raditional Dimension of History Explanation and Its Improper Treatment: Taking Yi Zhongtian's *Appreciation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s an Example

GE Hongbing, XU Wei

(Chinese Depart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synthesi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enabled Chinese history to possess three value orientations in ancient times, which were reflected by temples, scholars and common people. Their evolvement up to the present time has reduced them to explanation of history in the form of drama or play and to the lopsided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actices of entertainment. Yi Zhongtian's *Appreciation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flaunts the banner of the elite's culture, in fact it is something vulgar that resembles neither literature nor history. It explains the aesthetic ideal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s political trickery, desire and interests. Its influence is extremely abominable.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history should be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cending shallow historical phenomena and enhanced to the level of the thinking of the historical spirit from the angle of philosophy.

Key words: the synthesi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Yi Zhongtian, *Appreciation of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责任编辑:吴晓明)